

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二十八集

柏 格 里 在 中 国

(翻译稿)

贵 州 省 民 族 研 究 所 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柏格里在中国

一位传教士坚韧不拔地在广袤的中国鲜为人知的地区的坎坷历程

[英]沃尔特·柏格理 著

苏大龙 译

序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都是多民族的省份，苗族是居住在这两省人数较多的兄弟民族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对包括苗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并出版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各类专著（包括整理、重印和翻译一部分1949年以前的中外文资料和著述）。民族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苗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大量进入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都曾有过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因此，研究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有必要搜集、翻译一些记载当年外国传教士活动的外文著述（包括外国传教士本人撰写的调查报告和见闻录一类的资料）。

在解放前曾到中国大陆活动过的西方传教士中，英国循道公会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是在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带的苗族聚居区域活动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的一人。

柏格理1864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1887年来我国云南昭通等地传教，1904年到贵州威宁等地传教，1915年患伤寒病死于威宁县石门坎（今该县中水区石门乡）。柏格理在我国西南地区传教长达28年之久，在滇东北、黔西北苗族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本书对柏格理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柏格理在我国从事传教活动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读者通过本书的许多情节，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年我国西南边远的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一）不同民族之间以及某个民族内部的各种关系；（二）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官府及当地土司、土目及地主之间的关系；（三）外国传教士与苗族群众、彝族群众之间的关系；（四）外国传教士与本国政府和本教派差令之间的关系。本书对当时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也有详细具体的叙述。上述各项内容对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了解外国教会早年在我国的传教活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译者苏大龙同志长期在贵州民族学院从事英语教学工作。鉴于少数民族在贵州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我院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大龙同志计划选译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的英文著述；所译《中国西南南部落中》一书已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于1985年出版。

在《柏格理在中国》一书的翻译进程中，译者曾就本书的翻译问题多次和我交谈并就原文内容及译文用词等进行认真推敲，他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使全书译文质量达到了应有的水平。译稿完成后，大龙同志要我为译本作序，因将个人对本书的一些看法简述如上。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张正东

1987年7月7日

目 录

- 序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 第二章 首次历程
- 第三章 进入昭通
- 第四章 云南府
- 第五章 叛乱
- 第六章 龙洞
- 第七章 进入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区
- 第八章 彝区探险
- 第九章 彝区探险(续)
- 第十章 在彝区的最后阶段
- 第十一章 苗民的到来
- 第十二章 石门坎
- 第十三章 绝处逢生
- 第十四章 进展与恐怖
- 第十五章 “先生”
- 译者后记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日落时分，在一地处中国西部边远山区某交界地带的寨落，一伙年轻人正在进行格斗训练。

斗士们挥舞大刀长矛，在来回拼杀中显露出他们灵巧娴熟的攻防之术；“投石手”也正为其大显身手而忙于准备。投石表演往往激起人们更高的兴致。格斗双方的每一举动都会使得观战者们为之目不转睛。一个能在 20 码开外扔出石块准确击中其敌手的人在搏斗中必占上风，此为西部山区部落中的斗士所共知。此外，若他同时还能熟练地用缠在左臂上的皮制臂铠挡御对手飞来的石块，那么他将必胜无疑。

因以训练为目的，斗士们以土块代石块。两位动作敏捷的年轻人保持在相隔 50 英尺左右的距离间，互相对击土块。这两人的前臂上均戴一皮制臂铠，这种臂铠用以挡开那些疾不及防的土块。观众为斗士们灵活的闪避或以臂铠及时挡御对方之击的精彩场面欢呼喝采，也对投石者成功地命中对方报以由衷的欢笑。

有一位身穿黑色英国西服的外国人正在一旁观看，他对斗士们的技艺深感钦佩。在前往西部边远地区考察途中，他恰于那天抵达这个寨子。山区部落中斗士们的格斗训练为他有生以来首次所见，这种训练方法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圈子里外的人们都觉察出这位客人由此产生的兴趣。经过一阵简短的议论之后，一位年轻人走上前来，面带笑容地请这位“来自河那边的人”施展一番他的功夫。

山里人向他飞来的第一击，使这位陌生人回想起在其故乡得文郡的那所学校里的板球场上度过的日子。对疾速而至的土块他并不闪让，而是本能地伸手接住，并迅速扔回对方。这一出人意料之外的动作使观众们惊愕不已。当接二连三地飞来的土块同样被这位客人以其干净利落的动作“接住”、“扔回”时，人群中响起了一片为之诧异的嗡嗡议论声。“有谁能击中这位站在那里用手接住土块的人？”“他既能接住土块，也定能接住石块。”“哪怕九个人同时朝他扔石块，也难以打中这位陌生人。”……两位从未见过格斗中有此一招的老手对这位令人惊叹的人的祖先究竟是何等之人感到纳闷。其中一人说，“象他这样的人必有祖传魔法。”另一人答道，“我很想知道有关他祖辈的传说，这些传说肯定会使人目瞪口呆。”倘若把这位从接板球之法接山里人投来之石的人的身世告诉那位老格斗手，那么，这位名叫塞缪尔·柏格理的传教士祖先的传说，就是有关康沃尔西部地区，罗马人入侵布立吞，岛上居民逃往西部山区，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名叫柏格理的部落，以及世代居住在康沃尔直至今日这一部落后裔的传说。

柏格理的父亲是一位巡回传教士，总部设在康沃尔的查梅福特。他的长子塞缪尔于 1864 年在此出生。

早在小塞缪尔 4 岁那年，他母亲就教他从用大号铅字排印的教会传单上学习认字。塞缪尔不象其他小男孩所惯常的那样使母亲费心——他时常独自一人坐上数小时之久，摆弄几根小枝条，用以搭成三角形或正方形而以此自娱。就此，从幼年时代起，他便崭露出

引人注目的数学才能及发展前途。

塞缪尔9岁时，父亲被委派到位于海边的康沃尔南部一个叫做佩里恩的小镇供职。就在佩里恩的韦斯列小学，这一小孩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正如一位真正的康沃尔之子，他在幼年时期便学会了游泳。游泳成了他的一技之长，他那高超的水性确曾不止一次地挽救了他的生命。

13岁那年，他进了得文郡的希博尔公学。在学校，他以其出众的数学才华立即博得了校长的喜爱。他那愉快活泼、充满生气的性格使他不久便赢得众望；他在50年的生涯中始终保持了这一性格。

柏格理的天资很快就使他成了这所学校的佼佼者，他似已踏上了进入一所名牌大学深造的门槛。但是，由于来自家庭的原因，他决定在接受昂贵的高等教育之前先去参加获得行政机构职员位的考试。他以全英第七名的成绩通过考试并开始在伦敦任职，尽管他所从事的职业本应由成年男子所从事。但他那男孩般的坐立不定仍是其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在高凳上连续坐上数小时之久的规矩同年轻的柏格理活跃的性格很不相适。闷热的办公室里的四面墙壁在他眼里活似笼子。向往一种自然生活的愿望使他难以自制。当他宣称决心以探险活动摆脱沉闷之境时，知其脾性的朋友毫不为之惊讶。那时，中国及中国人在世界历史上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内地还未留下白人的足迹。柏格理脑中开始萌发出探索这些未知之地的愿望，他希望能把那些愚昧落后的当地人引上先进文明之路，并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传说。他的这一抱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阅读了著名的非洲探险家利文斯顿医生的冒险经历所激起，一定程度上也为当时笼罩着中国的神秘魅力所吸引。故而，他志愿前往中国巡回传教，时年22岁。

柏格理读书时的好友弗兰克·戴蒙德恰好也在那时要求从事传教活动。1887年1月，他俩满怀喜悦之情，同搭一船前往东方。

旅途一帆风顺，两人平安地抵达了上海。在这里，他们遇上了踏上中国国土后所经历的第一个困难。中国人是一个与他们早在数千年之前相比变化甚微的民族。中国历史上5千年前的习俗在那时仍起支配作用。他们在习俗上的变化之微几乎使人闻所未闻。除了自己那种款式的服装之外，他们对任何其他都持怀疑憎恨的态度。在柏格理抵达之前，曾有几位白人想身穿西装漫游中国；但这些带进新方式、新说教的陌生人却因此引起了中国人对人他们的疑心和厌恶。中国人视英国礼帽为“铜盆”，裤子也得了“细袋”之称。

上岸不久，便有三位传教士热情地迎接了他俩并陪同他们先走进一家理发铺，尔后又到了裁缝铺。走出铺子时，这两人的装束从头到脚霍然一变，成了典型的中国人的模样——头戴小圆帽，上穿长袖上衣，下着肥大长裤，脚穿缎子鞋。他们甚至还在脑后拖着一条辫子，当然这是假辫。后来，柏格理以其一头好发终为自己留成了一条漂亮的辫子。翌日，两位伙伴便不失时机地开始了解上海。没隔多久，他们便发现了这一有着宽阔街道、高大楼房、形同英国城市的繁华之地所存在着的阴暗面。在住宅区中心，他们沿着路面破烂不堪的狭窄小街走进了靠昏暗的蜡烛灯照明的肮脏小巷。在此，他们目睹了中国人世代遭受的贫穷与苦难。柏格理非但没有因此而改变其选定的道路，眼前所见之景远比一切地更加坚定了他为减轻中国人民所蒙受的深重苦难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仅以当地穿戴开始他们的传教事业对于柏格理与他的伙伴而言尚不敷事业之需，只有

掌握了当地语言，他们的事业才能有所进展。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是前者有音调上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用高调说一汉字，此汉字表示某种意思，而用低调重复这一字时，其意思则迥然不同。诸如此类的字加之数以几千形象不同的汉字为掌握汉语所必须学会。这成了两位传教士所面临的一大困难。

在沿长江而上三天路程之远的地方有一座地名为甘泉的小城，那里有一所专为新来从事传教使命的传教士而设的培训学校。在这里，柏格理与戴蒙德两人在校长 F.W. 鲍勒牧师的精心教诲下全力以赴地学习与了解古老久远的中国习俗与语言。柏格理在那时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中国人计岁数的方法很奇怪，这一方法始于亚伯拉罕时期。当问起别人岁数时，得到回答往往是说明出生年份的生肖。每一年份均以一动物来表示。”

柏格理对克服语言中困难的强烈愿望与热情使他迅速掌握了汉语中一些极为棘手的难点。他深得中国内地会 W. 鲍勒牧师的悉心培养。鲍勒牧师不仅给予柏格理孜孜不倦的谆谆教诲，并以其崇高的品格感染了这位年轻的传教士。这位校长还向他展示了传教事业的美妙前景。这些信仰为柏格理在此后的整个传教生涯中信守不移。3 个月的语言学习之后，他作了用汉语演讲的首次尝试。他曾写道，“尽管那天听众人数不多，而我当时颤抖得有多厉害是可想而知的。事后，听众们虽说他们尚能听懂我的演讲；不过，我觉得中国人通常都是这么说的。”

又是 3 个月的艰苦训练使他顺利地通过了在那里的最后考试。这次考试不仅包含当代汉语的笔语及口语，而且还涉及孔夫子的经典著作。孔夫子是一位在 2500 多年前生活、立说的中国圣人。这些古汉语知识对柏格理在此后的传教生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因此而总是受到中国官吏们的敬重，这些人所处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兼理一般司法事务的地方官或治安官。由于他对当地习俗及语言的精通，加之他那古铜色的面孔及一头黑发，他屡屡被误认为是中国人；只有当他露出手臂，现出其白皙的皮肤，别人才相信他是一个英国人。

最后，在经过多次因故推迟之后，柏格理与他的同伴终于永远地离开了甘泉这座小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云南府，一个地处西南的城市。就此，两位传教士满怀希望地登上了江轮，开始了与 1200 英里波涛汹涌的长江进行搏斗的漫长旅程中的第一步。

第二章 首次历险

由西往东的长江把中国一划为二。下游近海处的江水深而平静，但其上游另是一番情景。柏格理将此描绘如下：“江水恰似一头咆哮奔腾、无法控制的猛虎——冲开大山，穿透顽石，咆哮，狂怒，残忍无情地摧毁着世间一切。”

两位传教士搭船沿江而上，平安地抵达了汉口；汽轮在此靠岸后便开始了返航准备。他俩幸运地与两位富有经验的传教士范斯顿夫妇同路。经过范斯顿夫妇的一再交涉，他们总算从当地人那里雇到一艘小居家船，小船将他们送到沿江而上又是 300 英里之远的地方。

那时，坐船比现在便宜得多。对这段长达 14 天的行程，船主只要 11000 个铜钱的船费。由于 7000 个铜钱只相当 1 个英镑左右，这笔船费的数额并不足为多。

这艘居家船是一条带有船帆的平底船；船上有 4 个舱，共能容纳 7、8 人及其所带行李。船上没有螺旋或推进器装置，主要依靠“人力”驱动。当小船往上游而行时，船只被系上两根长绳，江岸边的两伙人肩背绳索将船往前拖行。舵手立于船头的平台，用一长桨掌舵以掌握船的航向。他的职责是密切注视江流的缓急变化并掌好舵把，因江水的不同流速对于江岸边的纤夫具有直接的影响。

当江水平静，水流缓缓而行时，拖行尚不费力，纤夫们肩上的纤绳只需微微绷紧，他们可站直身体，轻松地大步向前；此时，歌号声声，行进速度很快。但当江岸由宽转窄，平稳的江水变为奔腾急流时，纤夫肩上的绳索紧绷，上身极度前倾以致面孔朝地，此时需全力拖拉才能征服急流。水面上的白色泡沫及远处传来的轰鸣声能使纤夫断定湍滩即临。此时，纤夫们的歌号声随之而逝，因在再抵平静的江面之前呼吸极为重要。四位手持结实撑篙的男子站到舵手身旁，一边各两人；他们知道要使船只避开湍滩上密布的岩石单凭摆动舵桨有时难以对付，因而还须从撑篙迅捷有力地挡开江中危石暗礁。进入湍滩后，江水在船底似沸水般地滚动，浪花飞溅，前进中的阻力巨大。纤夫们气喘吁吁，膝盖着地，竭尽全力奋发向前。每前进一步都堪称一次搏斗；奋斗之中，全体纤夫们的用力还必须高度协调。当到达水流最急的江面时，汹涌的江水使他们只能把脚伸进沙里或以双手紧抓岩石上的钩状突出部分，直至有人前来援助，援助者们从附近的田野或屋里冲到江边，使劲拉动纤索直至船只脱离险区。有时，纤索因被拖曳过度而断折；遇此，船只便完全任凭江水摆布，除非舵手能侥幸地力挽险情，否则，失事的结局无法避免。

船只继续沿江而上，江中湍滩迭出，同急流的搏斗接连不断。这伙传教士们饱尝了穿越湍滩急流的滋味。柏格理在他所著的《在中国的困境》一书中写道：“木船抵达了长江中最危险的湍滩之一。又有一些人被雇来相助我们渡过这个难关。突然，从船前部传来了一阵惊呼声。发生了什么情况？原来船身正向左舷倾侧！人已无法站稳！我们急忙冲往船舵右侧，想以此加重此侧压力。江水对我们如此之举动会觉得荒谬可笑！此刻水流正以压倒一切之势涌入船舵。我们已料船只失事无可避免，全船之人都将被抛入浪滔汹涌的江水之

中。我竭尽全力一寸一寸地爬向舵门，咆哮的江水将我击倒，水流把我淹没。顷刻之际，船只及船上所有人皆被江水复盖；我们已落入走投无路的境地。然而，即使在此危难之时，我们心中的充满希望，毫无惧色。我们心想：‘派我们到中国西部传教的上帝不会让我们在这里淹死的。’险情进一步恶化，猛虎般的江水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涌来，小船被冲得粉碎，船板、地席、桨橹、桅杆及船帆被抛得七零八落。经过艰苦的挣扎，我们总算露出了水面。在急旋的回流中，我们不觉发现自己正抓着破船的残骸碎片。范斯顿夫妇虽浑身湿透，却仍精神饱满，手拉手地抓着一口木箱。弗兰克·戴蒙德踪影全无。最后结果如何？在这可怕的江水中游泳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们身穿的中国式棉袄一个劲地使我们往下沉！突然，岸上有人高呼：‘红船来啦！红船来啦！’转眼间，两艘红船便朝着灾难现场急驶而来。中国的救生船都被漆为红色，长江上的红船业在整个中国的红船业中可谓首屈一指。救生船上的船夫们有力地挥舞船桨，红船飞速而临。在这猛虎般的江面上常年奋斗使他们练就了一身征服江水的本领。他们来了！这伙强壮的中国船夫来得太好了！由于我们穿着中式服装，他们以为所救的是自己的同胞；而当接近我们时，他们从我们脸上看到了我们的白肤，认出我们是外国人，于是便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打算扔下外国人不顾，眼看他们葬身江中而以此为乐吗？这些人毫无此念。他们很快便将我们拖上了救生船。范斯顿夫妇上了其中一艘，我上了另外一艘。为了救我的性命，红船上的船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由于我的棉袍被江水浸透，他们中几个人奋力拖拉才把我安全地救到船上。这简直是一场在汹涌的江水与老练的船夫间进行的拔河赛，船夫获得了胜利。

弗兰克究竟在哪里？载着我的那条船开始了沿江搜寻。原来，船只失事时他跳入水中，但因跳水时在岩石上碰伤而多处青肿。好在他的水性不错，他往下游游了一程。感谢上帝！我们两位同学好友又一次转危为安了。经过与船夫们的简单商议之后，我们说服了他们将我们的湿衣服换成干的。上岸后前往一处小客栈投宿之时，我们身后跟着一大群人，原因是我们当时的模样在他们眼里实在是太可笑了！我们的帽子、辫子全在水中挣扎时失落了，那时我们活象立在田地里吓唬鸟雀的稻草人。”

事过多年之后，柏格理写道，“那位似狂怒的猛虎般的江中之魔对我的抛打、折磨距今已近三十年，而当时的情景即使在今天仍栩栩如生地映现在我脑海之中。”

尽管所来的大部分行李在奔腾的江中丢失，他们从未因此产生丝毫沮丧之感。他们顺利地租了两条小船到了重庆——一个处长江可航江段最高处的城市，离上海约有2000英里之远。在这段航程中，这些传教士忍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他们没有叉匙碟盆这类餐具，一把装在衣袋里的小刀被当作切肉刀使用，进餐时只得用手抓食或以筷子夹食。在习惯使用筷子之前，用筷子吃饭常使人感到很不方便。此外，船主动辄发怒，厉声责骂船工的态度更增添了柏格理等人的烦恼。经过3多星期诸如此类的艰辛，他们一伙终于到达了重庆。他们在重庆分手，取道陆路继续西行。

虽然由于长江上廉价的往返运输所带来的贸易使重庆在那时已是一座繁荣城市，但通往那里的内陆交通仍极其落后。那里根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铺筑路面，就连在靠近城边的较好路面上车辆也难以安全通过。当时那里唯一的运输方式是马驮，中国的这类牲口一船都不大，体轻耐劳，脚步稳健。

在添置了丢损的衣服被褥，备足途中食物之后，这两位传教士开始了穿山越岭的长途

跋涉——时而骑马，时而步行。行至第三天时他们平安的旅行被一件发生在一个拥挤的寨子中的事件所打乱。正当柏格理牵着马穿行于拥挤的集市时，一汉族摊主猛地将货摊向他推去，故意把一些货物散落在他的道前。柏格理见状急忙扶往竹摊，避免了竹摊的坍塌。但这正中这位狡猾的摊主诡计。他见此得逞便粗鲁地责骂这位外国人毁了他的财产。他的企图是以此引来一大群对他抱以同情的人们，尔后向这位不受欢迎的传教士敲诈一大笔铜钱，以作为对他的“损失”的赔偿。柏格理写道：“这位摊主怒气勃发，把我的马一把抓住。看到这位外国人陷入困境，一大群人围了上来以观热闹。因我的种种努力皆无结果，我便不再同这摊主说理。我向他表示愿出一些铜钱予以赔偿。于是，他的儿子将我的马牵到一个马厩，我与摊主一同前去茶馆协商损失赔偿事宜。此事造成的实际损失至多不过50个铜钱，而我答应给他200（相当于16便士）。然而，摊主仍不肯就此罢休，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一片吵闹喧嚣。我们的向导建议我给那人300个铜钱，我便如数付给了摊主。经过再三鞠躬致歉之后，我们总算平安离去。”

越往西去，道路越是崎岖难行。有一次，柏格理所骑之马在企图超过一群骡子时被绊跌，柏格理被从马的头上腾空抛出。每天天黑，他们总是投宿在沿途的就近客栈。那里的住宿条件极差，食物粗糙，房间肮脏，屋外年轻人发出的歌声笑声无休止地打扰着他们的睡眠。雨水屡屡透进屋顶弄湿他们的行李。在他们行程中的第13天，柏格理描述了如下—事，从中可足见中国西部贫穷面貌之一斑。他写道：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位正在步履艰难地攀登一座陡峭山坡的男孩，他肩上扛着一只沉重的大口袋。我把他喊住并问了他几个问题。从他的回答中我得知他上路已有7天之久，正把一批货物背到一个尚需再走3天路程的地方。他背的口袋重约120磅，如此一趟所得之酬仅为660个铜钱。途中，这男孩艰苦地行走几步便要休息一会儿，一路上如此边走边歇而行。试想，一个13岁的男孩背着一英担多重的货物，沿着岩石遍布的山路走上10天的全部收入竟还不足2先令！”

道路开始沿山坡而上。连日来，由于连续不停的暴风雪，这两位传教士遭受的艰辛与日俱增；那匹马因掉了两片蹄铁而变得一瘸一拐，所食之物量少质次，不敷人体所需。但是，他们的情绪从不因此低落。纵然精疲力尽，腿酸脚痛，他们仍不停地向前拖着疲乏的肢体。在开始陆路行程的第22天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从长江边改走陆路起到终点云南府途中一半路程处的昭通城。一位友好的传教士迎接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了一所他们将在此暂住的小屋。

“那所小屋便是中国最小的传教所之一，”柏格理写道，“租金每月半克朗（一克朗为英国旧制5先令硬币——译者注）。屋里有一上一下两个房间；屋后是一个局部盖有顶棚的小院，我们的那匹马就居于此处，并在此大声地咀嚼饲料。小院旁，有一汉族‘男仆’为我们做饭烧菜。我们把楼下房间当餐室兼书房之用，楼上房间则用作卧室。屋里有一上下楼的扶梯；楼上楼下共用一扇纸糊的小窗。

我们尽己所能地把上屋收拾得较前干净舒适了些。屋里家具粗陋不堪，特别是椅子又直又硬！所处的环境虽然艰苦，但我俩从不在意；我们心中充满勇气，我们是上帝的战士，为了上帝忍受艰难困苦，我们心甘情愿。”

第三章 进入昭通

尽管柏格理在头天很晚之时始抵昭通，他不顾浑身酸痛于翌日一早便外出观察这一城市的内城区域。同在上海时的感觉相似，这里的贫穷落后及人们的痛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了解，柏格理即把接触贫民，尽他所能地为他们提供可能的帮助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发觉，当地人那种因出于想看看他这位外国人的模样、听听他的说话而产生的好奇心常常会引起上千人之多的听众。遇此情况，布道很是费劲，但他很快就和一些热心的听众结成了好友。他写道，“每天下午我们都在街上布讲教义、出售基督教书籍。出于尽可能扩大影响的愿望，我们常分头上街。弗兰克去城西门热闹处；我到城中集市区，那里聚集着城里的所有三教九流——算命先生、江湖郎中、赌徒、说书先生及调皮捣蛋的少年。我俩分别站立在这两处，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以我们想象中的最好方式，向他们讲述有关耶稣的事迹。人们不时向传教士提出问题，听众们对此津津有味。

在用茶点时分（一般在下午5时左右——译者注）我俩都各自返回小屋，互通情况。做完茶点之后的礼拜式后，我们便继续进行调查，直到10点钟上床就寝。我们的生活正如以上所述，在紧张而愉快中度过。不久之后，因我们初到那天迎接我们的那位传教士需暂离昭通，长途跋涉去一邻省，我俩便独在那里过了数月之久，继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及开展艰苦的传教工作。

一天，弗兰克从西门返回，感到身体极为不舒，剧烈的头痛使他无法进行往常所做的工作。我们原以为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就会安然无事，但第二天他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第三天时，情况更糟；最后，我们都为之着急起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一场重病的征兆吗？但愿不是！可从事实看来，情况恰似如此。在这一西部城市里，我俩是举目无亲的，孤零零的英国人，离此最近的医生也远在千里之外。

虽然没有医生的帮助，我们有一两本医药书可供查阅。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是如何逐页查找，急切地翻阅各种疾病的症状时的情景。这令人苦恼的剧烈头痛会不会是许多传教士都为之担忧的疟疾？会不会是伤寒？会不会是别的什么致命之疾？或这只是数日之内即会消失的因急性消化不良而引起的症状？

我一页一页地往下翻阅，仔细查阅书上对于各种疾病症状的介绍。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恰同弗兰克症状相似的疾病——一行接一行的症状介绍与弗兰克的病情全然一致。看着那一页的篇名，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会是……？不！不！！不!!! 这决不可能！我再也不愿继续往下看了。我要翻找一些病情较为简单、易于护理、不太会致人于死亡、进棺材、进坟墓的病症。可那本令人毛骨悚然、消魂夺魄的医书里似乎充满了各种各样均与弗兰克的症状相似的疾病。于是，我迫使自己放下那本医书，面临注定必然的命运。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和恐怖无情的病魔——以杀人为乐的刽子手，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这一病魔在中国被称为‘天花’。中国人对此惧怕无比，

以至不敢谈论‘天花’所引起的残酷无情的病状，生怕会因此而冒犯司此疾病的魔鬼，从而遭受其可怕的报复。在‘天花’这一富有迷惑力的名称之下，有谁会将此同那种令人心寒胆战、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相联系？可事实恰恰如此！我们确实面临着同天花的搏斗，但在这场与病魔的斗争中我们缺乏应有的准备。

天花！你能想象这种疾病吗？而且就在这每星期租金7个半便士的蹙脚小屋里！在距此两个月行程之内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医生！附近又不见一拉护士！没有合适的食物！睡在粗糙的木板上！住在只有半扇纸窗的卧室里！只有一把通往卧室的扶梯！屋顶如此之低，有的地方连人都无法站直；太阳整日无情地晾晒着恰好位于床的上方的瓦片之上。所有这些象在迫不及待地要夺走这位病人的生命！

那些恐怖的日子实是令人难以忘却，当时真可谓度日如年。在那段时间里，很多人对这两位外国人究竟在何处感到迷惑不解；有些人却对此却毫无觉察；我们则独自呆在小屋里忍受与等待。

在弗兰克第一次休克之后，我们开始了与疾痛的斗争。我们以所知的最好办法，一天又一天地用自己的力量、耐心及希望，昼夜不停地同病魔较量。这场搏斗不是躲在坚不可摧的堡垒里的远距离炮击战，而是战壕里的白刃战。我们简直不敢想象最后的结果。弗兰克病情不断恶化，我也确已心力交瘁。在此期间，我日日夜夜地守护在他身旁，从不脱衣而睡。弗兰克的神志经常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我们在往日外出布道时，街上的顽童常惹我们不快，跟在我们身后叫喊，以他们所知的各种方式烦扰我们。弗兰克在昏迷中似乎觉得他们正围在他床边，故而不时要我把他们驱走。回想起我当时挥手赶跑那些并不存在的‘顽童’时的情形真是令人可笑。如此‘驱赶’能使我这位患病的同伴暂时平息片刻，给他带来一丝安宁。‘萨姆’（‘塞缪尔’的昵称——译者注）！他们又在这里了！瞧！他们又来了！——听到他这一突而又起的悲痛的叫喊声实是使人怜悯。在那些日子里强装笑容确非容易之事。”

尽管在之后的岁月里，柏格理同死亡进行了多次的斗争，而与这一病魔的首次交锋所留下的印象却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脑海之中。他说：“那段我从未脱衣而睡的头四个星期所留下的回忆恰似一场恶梦。”

他继续写道，“此后的一天下午，情况开始好转。这位传教士终于慢慢地爬出了死荫的幽谷；他逐渐能起床下地，缓慢地顺着扶梯爬到楼下。遇此，我便走在前面；这样，即使他滑落下来也可以跌倒在‘软’物之上。到了那时，我们又恢复了原有的欢声笑语，能从苦恼中看到欢乐了。在患天花之后逐渐恢复健康的期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接着，我开始对所有物品进行消毒。我们在一堆大火上架起一口大铁锅，并把所有能煮之物丢入锅里煮沸。当地人被用锅煮衣服之事逗得乐极了！这在他们看来似为荒谬绝伦之事。”

就这样，在同死神的首次较量中，经过这场难忘的殊死之争，两位传教士成了斗争中的胜利者。

在同“天花”的斗争结束几天之后，有位传教士因得悉这两位新来者中有一位病倒而从云南专程赶来。于是，柏格理总算得到了短暂应得的休息。

但是，他那不愿静止的性格使他不能清闲持久。就在弗兰克正处缓慢恢复原有身心活力之时，柏格理勇敢地面对了因大烟引起的各种严重结果。中国人吸大烟甚为厉害。大烟是他们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汗液而制成的毒品。这种习惯一旦染上便难以戒掉。常有人因吸

烟过量，以至造成由此产生的极度痛苦及沮丧感使其痛不欲生。柏格理在述及他所处理的第一个因吸大烟而企图轻生的人时写道：

“有一男子冲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能否立即去抢救一位吸大烟的自杀者。那位来自云南的年长传教士与我闻讯后急忙全速赶去。坐轿穿城后，我们来到了这位自杀未遂者的家。他的朋友把我带进了他的房间，我们看到了屋里那位狂怒的男子。因某些事情使其心中烦恼，便决定吞服大剂量的鸦片而自绝。他的朋友及时察觉了他的这一行为，便即刻救助于传教士前来帮忙。我们一进屋便预感到挽救其生命定要经过一阵艰苦的努力。外国人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吓住了这位已经吞下鸦片的男子。我们借着这一有利因素劝其吞下那盆事先准备好的催吐剂——硫酸盐溶液；但种种劝说均告无效，那人闭口拒服。我们对此甚感遗憾，决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他的一些朋友前来相助，但极怕因此使其受伤；所以，在这过程之中主要是靠两位传教士所作的努力。”

这场奋斗持久、激烈。企图自杀的这一男子不让我们接近，使他人无法将其控制。最后，我们终于把他掀倒在桌上，并牢牢地将其按住。因他还在死命挣扎，我们便卸下了一块沉重的门板，以此压在他身上；我坐于门板之上以稳住其位置。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也纷纷抓住其手脚，我的同伴便开始对他施用催吐药。即使如此，那人还是未被制服；他咬紧牙关不肯张嘴。出于无奈，我们只得以一双筷子将他嘴巴撬开，用汤匙把催吐溶液灌进他的口中。我们渐渐获得成功，不多时便高兴地看到他脱离了危险。那种狂怒发作之后，他恢复了平静。在我们离去之时他已完全地屈从于我们了。由于这种症状在发作时极为严重，中国人认为比乃魔鬼缠身；时常有人询问是否能在用药之前将魔鬼逐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那人是如何被夹于桌子与门板之间，我又是怎样压坐在他身上时的情形。但愿我们的如此举动并未过分地有伤他的自尊心；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挽回了他的生命。”

柏格理在对付致命的鸦片中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使他名声大振。中国人惯于夸张；这位年轻的传教士能治愈百病之说便迅速传开。结果，他所住的小屋每天都被一大群人包围。据说：有些人是因出于好奇，仅为看一眼这位连死神都能征服的神奇的人而来；还有的人为一些小伤小病而迫切想试用一下外国药品前来此外；有时残废人、瞎子也会蹒跚入屋，引人哀怜地痛哭，想知其所受之疾痛能否治愈；另有个别一些嘈杂喧闹者则是为了奚落这位“外国鬼”所传播的教义而至。

柏格理日复一日地在集市上继续他的布道，每次总有一群聚精会神的听众。间或，有人会在天黑之时来到他的住所，要求与其个别交谈。柏格理在日记中记了如下一事：

“有个人来到我屋里，他谈起在几个星期之前由于在某一事上的不顺使其沮丧消沉而生上吊之念，但他转念一想自己不能死去！因曾听过我的一、两次布道，他决心再也不去求助于直至那时并未使其交上好运的神像了；于是，他渴望懂得更多的教义，特别是若这些教义能有助于他。”

有一次，正当柏格理从城里返回时，他听到身后传来嘈杂的叫喊声。回身一看，一伙激昂喧嚷的人群正朝着他的方向飞奔而来。他停下脚步，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从那片混乱声中他听到了“抓贼”抓贼！”的喊声。当这伙人距他越来越近时，有一似逃命般的人影从他面前一掠而过。柏格理当即断定那人正是企图逃跑的盗贼。他立即追了上去，经过一阵激烈的疾跑将其抓获，并揪着这一还在挣扎的盗贼穿过大街送至警察局。这位跑得如此之

快的传教士给那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在此之前曾嘲笑过这位传教士以及他那奇怪的教义的人此时也对他刮目相看了。

不过，柏格理也遭受了诸多的冷淡及漠视。他在城里大街上行走时，常有人在他背后恶意咒骂；无知的妇女慌忙将其幼儿抱进屋里，生怕孩子会中这外国人的邪咒。然而，如此对待丝毫没有动摇这位勇敢无畏的男子汉。他仍继续进行着日常的布道，竭其所能地为病者解除痛苦，以其朴素真诚之心逐渐地使得那些曾经漫骂过他的人们对他那沉着镇静的姿态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

长时期的健康恢复加之渴望重与同伴携手共事的强烈愿望，使弗兰克慢慢恢复了正常健康活力。离此外出的那位传教士从邻省返回使这两位年轻人得以继续踏上他们到云南府的这一第三阶段或称最后阶段的旅程。在此后的几天中，他们打点行装，准备途中食物，并雇了几个脚夫伴随他们上路。有位来自数日路程之远，也恰往云南府的路人与他们同行。告别昭通之后，这三人开始了他们长达14天的陆路旅程。这一旅程从头至尾祸患重重。第一天他们因薄雾耽搁了行程，途中所有客栈均告客满，他们只得另找歇处。第三天夜晚脚夫逃跑，偷走了他们的大部分行李。连绵不继的阴雨使情况变得更糟。在中国西部，有时雨水会无休止地持续半个月之久。虽说途中阴雨连绵而道路难行，缺乏食物而饥肠辘辘，这三人仍勇敢地奋力向前。对此柏格理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

“我们三人同盖一条被子。有一次，我们睡于泥地之上；为了凑拢起见，我们睡成一端是两个脑袋一双脚；另一端为两双脚之间夹着一个脑袋。日复一日，我们冒着阴雨艰苦顽强地跋涉在泥泞小道上。一位在我们行程终点迎接我们的传教士T·范斯顿牧师把我们说成他平生所见的最为狼狈的传教士。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总算活了下来，几个月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险境毕竟已成过去。”

就此，在七月的一个天色阴沉之晨，这三人带着满身泥浆，疲惫不堪地拖动他们浑身酸痛的肢体，通过高大的砖墙，由北门迈进了中国西部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云南府。

第四章 云南府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有一个对于那些希望隐居他乡的人似具一种特殊吸引力的城市。例如：美国的旧金山、智利的瓦尔帕莱索、俄国的阿尔汉格尔皆为如此之地。

处于 1888 年之时的云南府就是一座诸如此类的城市。这里居住着为数众多的来自异国他乡的反叛者、强盗、流放者及在逃犯。他们抛弃了过去了生活方式，改名换姓地开始了其人生历史上新的一页。他们在遥远的云南找到了安全的隐避之地；这里远隔上海、北京警方所辖范围数千英里之外。

这座城市有极好的城防，围城 4 英里之长的厚实砖墙将城内外隔绝。整个城墙间的六道城门为唯一的进出之径。

今天，同世界上别的城市一样，云南府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城里有漂亮的街道、火车、公共建筑物以及先进的电力照明设施。但是，直至十九世纪末，这些由现代化带来的进步在那里还根本一无所有。当时的交通运输手段只能依靠马、骡及脚夫。城里最大的建筑物是一座为抚慰神话中的恶神而修建，但已陈旧破烂、行将崩坍的庙宇。光线微弱的油灯仍被广泛使用。背街小路高低不平，连马车在此通行也很危险。居民住宅为板木结构，窗户玻璃一般都由透明纸张代替。每当外国人沿着这铺着鹅卵石、凹凸不平的狭窄小街，穿行于拥挤的人群之中时，街上的吵闹喧嚣声立即被人们沉默好奇的眼神所取代。

在蹙脚的陋室中度过了已经过去的半年之后，这两位传教士住进了一所堪称舒适的传教所。除了柏格理和戴蒙德两人之外，传教所里还住着几位善同中国人打交道的年长传教士；他们在一起结成了一伙愉快之伴。

柏格理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用以熟悉云南府的城内外环境，尔后便开始似在昭通时所进行的日常布道。他以一种新奇的方法吸引听众——他用 500 个铜钱在集市上买了一张大铜锣；沿街行走之时，他大声地敲响铜锣，人们闻声便会成群涌来，抱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这位白人究竟要干什么。接着，他便让人群围扰在自己四周，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这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因为中国人对神像的崇拜根深蒂固，世代相传。要扭转他们的这种崇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由于柏格理以其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地从事着他的事业，有些人开始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还善同孩子们交朋友，孩子们也很快就消失了原先或许存在着的对这位外国人的惧怕。每当铜锣一响，他们便奔上前去占住了紧挨传教士的位置。

传教所旁边有一所小屋，柏格理提议将此屋改为孩子们读书的教室。没隔多久，这一设想便得以实现。每晚都有一些孩子前来接受这位先生的教诲。每次安息日均为主日学时间。起初，当母亲的不让其子女接近这位“外国鬼”；当地人中的一些无知者甚至对柏格理抱有一种极端愚昧的揣度。因看到柏格理长着蓝色的眼睛，他们便以为他没有正常的视觉能力。这些迷信的人们竟然想象他企图拐骗孩子，将他们吃掉而使自己的眼睛变黑，以便获得正常的视力。有些人则认为他的双眼具有洞察一切的目力，甚至能看透地底最深之

处。

若母亲不让其子女去那白人所办的学校，有时孩子则会违命自往。但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一回家中便难逃毒打，有些孩子甚至被用链条拴于桌腿上。

柏格理逐渐地使得家长们消除了这种反对。中国人一贯敬重有学问的人。因此，家家户户都择一男孩上学，并望其能读书成才。他们不惜代价地确保这一孩子能完成学业。当这孩子成长长大，学有所成时，他便成了他人敬重的对象。此时，他便高人一等，凡周围发生的任何巨细问题皆由他决断。中国人对所有印刷物都看得很重，就连烧毁或撕破一页印刷品也会被视为渎圣。

有鉴于此，当父母看着自己的子女手捧活页及用汉语印刷的小书本从传教所返回时，他们便开始踌躇思索；当孩子能用汉文背诵诗文时，父母变得更为宽厚。数月之后，他们彻底解除了对这位“外国鬼”以及他那些奇怪方式的怀疑。

在一个冬天傍晚的落日时分，一位丹麦人抵达云南府。柏格理很快与他结为朋友。当这位丹麦人将一台幻灯机借给他时，柏格理喜出望外；两人开始共同准备主日学聚餐。是日，一大群孩子中午一过便赶来参加，由于作业业已完成，整个下午便可纵情地玩耍嬉戏。聚餐开始了，孩子们坐在小桌旁接受传教士的款待。碗里盛着米饭；鸡肉、猪肉皆为大家所喜爱的食物，此后还有美味的中国甜食。聚餐后，孩子们极望还能多玩一阵。柏格理有一个小型电震线图，摇动其手柄便会产生电震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将两根从电池上引出的金属线置于一盆水中，并将几个半便士（英国旧制铜币名——译者注）丢入盆底，然后摇动手柄。孩子们试图拾起盆中硬币，但由于水流过急而无一告成。夜幕降临，詹森（那位丹麦人）同我一起架起了幻灯机；此时，孩子们激动异常。放映幻灯时，有两、三位家长竟不知该逃离幕布上的图象为好，还是冒着中魔的危险留下观看为好！”

在云南府传教的进展如此令人满意使得柏格理期望能进一步扩大他的事业范围。心怀这一愿望，他搞到了一幅标有边沿村寨的地图，并把这些边沿村寨划分为块。然后，他带上足以应付两、三天的食物，骑马依次走访这些村寨。这项工作与在城里的日常所事很不相同，所冒风险不乏其有。

有一次，柏格理与另一传教士一同外出。他们雇了一汉仆照管行李、煮饭做菜。这伙人走村窜寨，每到一处均呆上一、两天。

在他们巡行区的北部有一条河流。必须渡过这条河流，他们才能到达计划走访的又一地方。他们在离开此河南岸最后一个寨子时已是晚间。仆人探路闻得沿溪而下5英里处有一渡船可将他们送至打算前往的那一小镇附近。

到河边的路程确实不近，那位把这段距离说为5英里之远的人说话毫不过分。太阳早已西下，月光照亮了道路。

小径终于拐入了卵石遍布的河岸。因断定不了渡口究竟在哪一方向，他们便在此停步。正当猜测议论之际，他们听到有人踩着卵石走了过来。柏格理大声向他招唤并问其是否知道渡口的位置。那人走近答道他也是位等待过河的。隔不一会，来了一位妇女；她说：“今天别想过河了；船老大说今晚过河客人不多，他不想为此摆渡一趟。”此话真叫人泄气！一阵简短的商议之后，大家决定凑在一起，指望加上这么些新到之客会使船老大改变主意。少时，又有4人接踵而来，他们也打算在那天晚上过河，但因不能如愿而折回。往

前又走了几步之后，有一男子及两个男孩也追了上来。这样一来，他们一行已达 13 人；在他们看来，此时渡河可算有望了。

不一会儿，两位传教士便看到了前面闪烁着摇曳的火光；有一男孩发觉火光就在渡船附近，他开始对着火光高声呼唤。火光周围的人听到喊声，其中一人应声朝着这伙人走来。月光下，约在一百码之远处的渡船轮廓隐约可见。

此人听说他们意欲过河便宣称自己是代替船老大而来的，他在一块岩石上坐下，计算着这伙人的人数。随后，他搔搔头，若有所思地将整个河面扫视一遍。最后他说，船老大愿意马上把他们渡过河去，不过得要先付船费；船费为每位 300 个铜钱。就如此之短的渡程而言，300 个铜钱确非低廉之价。不过，在任何一笔交易之初，夸大实际要价是中国人的习惯。因此，当这位船老大的代理人抬头观看传教士对此的反应时，柏格理表示他的朋友和他愿出同其他渡客相同的船费；他深知那些中国渡客只愿付出公平合理的价格。

来到中国人不久，这些传教士便逐步摸透了中国人的买卖习惯。这些人每做一笔生意都要进行一番冗长烦琐的讨价还价，这连一杯茶这类的买卖也毫不例外。

因此，当这位船老大的代理人面对这伙人中的中国人提出 300 个铜钱的船费时，柏格理和他的朋友对即将随之而来的这类冗长的讨价还价早有准备。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那些人似对这一价格颇觉得公平合理。两位传教士面面相觑，不得其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两种可能性提醒了他们。要么就是在一个以买卖价格上的争论不休、讨价还价而出名的国家里，由于某些奇怪的巧合，其特征之例外都集中到这条内陆河的岸边来了；否则便是其中必然有诈。第一种设想实为异想天开；因而，为谨防上当，柏格理开始提出一系列询问。他所提出的问题很快便揭穿了他们的这一诡计。原来，那位自称的“代理人”就是船老大人；那些所谓的“渡客”无异于船上的伙计及一些共谋者。这帮人策划从这两位外国人手里骗取一小笔可观的船费。此外，他们还企图在预收船费后扔下这两位传教士，撑船溜之。

眼见阴谋败露，那伙人仓惶而逃。柏格理和他的朋友进退两难，对如何渡河不知所措。他们急得似要抱夺船只一般，而船主早把船只撑往河中，在远离岸边之处停泊。

在镇上吃了晚餐，经过约 5 英里的徒步夜行，两位传教士并未能够平安过河，而是束手无策地流落在河边。除了船上那伙不怀好意的人之外，那里一片荒凉。河边不能久留！于是，他们四下环顾，另想办法以摆脱困境。河边另有一条向外延伸的小径，似常有人行走，他们便决定顺此而行，盼望找到一个能以过夜的掩蔽之处。

虽说在月光之下，沿这条既陌生又凹凸不平的小路行走仍然十分艰难，稍不留意就会绊跌。有过路的捕鱼人向他们指引了一所位于一英里外的客栈。这所客栈阴沉昏暗，摇摇欲坠。不过，在中国西部比此更糟的客栈也属司空见惯。两位传教士为能找到这一过夜之处甚感欣慰。当他们提出投宿要求时，店主疑虑重重地摇头谢绝。他说道，对于能满足这两位贵客的要求而引以为荣，但他感到抱歉的是虽说客房空着，却不宜让贵人居住。

从那人认真的话语中柏格理断定那一地方染上了致命的瘟疫，他询问店主究竟出了什么麻烦。所得的回答是那间屋里有鬼魂作祟！一听到“鬼”字，沿着漆黑小道蹒跚而行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的那位仆人发出了一声恐怖的惊叫，而柏格理和他的朋友则明白了原来妨碍这里客房使用的唯一原因仅出于对鬼魂的惧怕而已。

柏格理将店主所述视为当地迷信意识中的一个实例。那人坚持认为一个月前曾有一位